

每年至少出版四辑。来稿请寄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史料》编辑组，勿寄私人，以免贻误。

本刊最近几辑的内容，以现代革命史为主，着重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地下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活动史料。其他历史时期的史料亦刊载一部分。

在第一辑里，除了转载一些报刊的资料外，还登载了广西幼儿师范学校负责人岑友鲲同志为本刊撰写的三篇文章。岑友鲲同志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为革命撰写史料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

柳州史料第一辑

目 录

广西区博物馆内文物陈列有关柳州部分史料

..... (1)

柳州地下党的一些情况.....梁山 (4)

忆陈光同志二三事.....岑友鲲 (7)

他战斗在黎明前.....叶惠明 (13)

联华印刷厂情况简介.....岑友鲲 (19)

侯信小传.....岑友鲲 (24)

浪溪江畔歼敌兵.....江 明 (35)

山村烈火.....韦达猷 陈汝生 (39)

柚子坳伏击战.....方 平 (43)

日记片断.....覃宝龙 (45)

附录：请不要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

.....黄少群 (58)

广西区博物馆内文物 陈列有关柳州部分史料

(内容摘要)

党的城市工作

一九四七年，城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隐蔽活动，保存力量，配合农村武装斗争。一九四八年各城市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并在青年学生中建立了“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一九四九年一月，成立了“中共广西城市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桂、邕、柳、梧四市的工作，并建立各种职工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加强了统战工作，为接管城市作了充分准备。

照：1948年1月，中共广西党组织在柳江县成团村召开桂、柳、邕三市党的负责同志会议，作出“一月决议”，为城市工作规定了具体任务。

文：1949年2月，党领导的秘密工会“湘桂黔铁路职工协会”和“湘桂黔工会”合并，并且成立“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这是该会的简章。

文：1949年4月成立“广西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是党团结知识分子及上层民主人士统一战线组织，这是该会的

简章。

文：1949年9月，“广西妇女解放联合会”成立，这是该会的简章。

文：1949年4月，“柳州学生联合会”成立，这是该会的简章。

物：这是中共柳州城工委负责同志收藏文件用的铁合。

文：“广西城市爱国民主青年会”（简称“爱青会”），是党领导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外围组织。这是“爱青会”所订的秘密工作条例。

文：1947年12月，中共广西党组织为了保守党的秘密，特为城市工作的同志制订了《秘密工作条例的通知》。

（1949、12、18、）

解放广西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土崩瓦解。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消灭残敌的命令。十一月初，解放大军从柳北、桂北、桂东、桂南四路向广西挺进，在各族人民和游击队的紧密配合和大力支援下，迅速解放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地，向白崇禧集团十七万多军队聚歼于粤西边境。十二月十一日，五星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至此，广西全境获得解放，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文：1949年10月24日，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对全体指战员发出配合解放大军作战的两项命令。

文：1949年9月25日，中共广西城工委在柳州鹧鸪江召开桂、邕、柳、梧四市党的负责同志会议，研究迎接大军的准备工作。这是“九月会议”的纪要。（1949年9月29——30日）

照：1949年7月24日，广西城工委在柳州市郊社湾村召开桂、柳、邕三市负责同志会议，研究迎接大军入城问题。这是“社湾会议”旧址。

柳州地下党的一些情况

梁 山口述 邱钟仑 钟运德 梁 昭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1959年4月24日

1941年地下党派一批同志到广西来，由胡习恒、熊元清两人负责柳州的地下工作。他们由1941年至解放一直在柳州。我是1947年才到柳州，所以对柳州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的，罗培元在柳州有一段时间也是负责人，陈枫同志也负责，他们可能更清楚些，不过听说一些情况。

1941年7月9日广西省委设在桂林，省委负责同志被抓，党的力量在城市。42年1月15日党的事业被敌人破坏很大，许多进步群众都被敌人抓，广西称为“一·一五”事件，这事件发生后，广西党的力量转入农村，长期隐蔽生根，在农村当农民，搞农场。

1944年9月20日——1945年7月，日寇进入广西，这段时间组织敌后游击战争，1946年柳州、桂林又遭破坏，46年领导学生反饥饿。

1947年组织武工队，在百色、平乐等地一带活动，短小精干的，三、五个在农村活动，发动群众进行宣传鼓动。

1944年——1945年柳州市党内同志都搬空，日

寇投降后，同志才陆续回来，1946年陈枫同志才从广东调来柳州，（先去桂林，后来到柳州。）1946年7月，广西党组织召开“七月会议”，把新旧组织合并（即把陈枫等由广东来的同志与广西原来同志合并），1947年“十月会议”决定方针政策，建立“爱青会”。48年1月省委在柳江县成团熊柳生家里召开“省工委会议”，研究决定1948年工作，口号是“争取时机，深入下层”……。1949年1月，省委在桂林高天梅家（住址象鼻山脚下）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内容是“大胆发动群众斗争，培养干部，准备里应外合，迎接大军，解放华南，解放广西”……。1949年7月，在柳州市郊区社湾村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总结党的工作，决定放开双手，大胆发动群众”……。49年8月，在鹧鸪江岸开会，布置迎接解放大军，完成城市调查工作……。

柳州市活动情况：我是两个组织合并后才来柳州的，城市工作不比农村，城市没有据点，全部都是秘密，不敢公开。46年以后，城市、农村工作分开，只有一个负责人联系，因为城市工作易于被敌人破坏，我们的力量主要在学校，龙城中学，文惠小学，师范学校等，以及政府机关，知识分子多，城市技术工人少。

47年10月及48年“一月会议”后，工作情况有些改变，主要力量放在文化界，龙城中学、中正、一中、高工、文惠小学的教师等。48年发展一些青年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建立一些组织：青年解放联合会、工农解放联合会、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等组织，共组织发展四百多

人，解放后留一百多人在柳州。

48年集中力量发展组织，壮大自己队伍。

49年搞工人运动，先一段做发动群众宣传教育工作，搞经济斗争，实际上是政治斗争，领导学校搞罢课运动，反饥饿等。（如柳高、柳师等）

49年以后，集中宣传党的政策，只限于散发传单，“鹧鸪江会议”后布置城市调查材料，搞两个多月。关于党的组织47年以后就分线，柳州是胡习恒负责。我们分工熊元清搞调查研究，胡搞宣传教育，我搞组织工作，城市工委是49年7月建立起来的。

（抄自区博物馆资料室）

忆陈光同志二三事

岑友鲲

陈光同志牺牲将近十五年了，可是每忆起他，总象和他刚刚会过面，仍然活着似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前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那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工作的精神永远不死。

我和陈光同志，是在一个和风送暖、百物萌动的春天，在柳城县的太平镇认识的。

一九四四年秋，日寇侵犯广西，国民党和他的部队闻风而逃，桂、柳、邕、梧四个城市，及交通沿线各县，很快即告沦陷。我和陈光同志，当时尚未认识，但却不约而同地都由柳州撤至罗城龙岸。他到龙岸后，即与当时柳州日报社长罗培元、总编辑张琛等同志共同策划，以柳州日报部分职工为基础，吸收当地进步青年参加，组织一支为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桂北行营警卫队。罗培元同志任队长，他任指导员，带领队伍至柳城沙浦一带，进行发动群众抗击敌人的活动。我到龙岸后，即参加当时为党所掌握的柳州日报工作，并以一个特派记者的名义，和几个同志到柳城县太平镇，成立一个“柳州日报办事处”，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前线新闻采访工作。一九四五年三月底，警卫队由沙浦转移至

太平镇后，我奉上级指示，将办事处的工作，交由梁罗琪同志负责，参加到警卫队去工作。于是，我和陈光同志就认识了。但他当时的名字是叫陈扬，还不知道他叫陈光，陈光这名是以后我才知道的。

我和陈光同志认识以后，就认为他是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同志。在警卫队工作时，由于工作和生活在一起，接近和交谈之多，自不必说，就是日本投降后，警卫队解散，他仍回柳州龙城中学任教，我仍回柳州日报（后改为广西日报柳州分社）工作，这段时间，虽然工作的单位不同，我和他仍然经常接近。尤其在一九四六年底，党组织在柳州市东大路（即今中山东路）开办一间“联华印刷厂”之后，这厂由他负责领导，由我担任经理负责具体工作，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接近的机会就更多，凡是厂里遇到的困难和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我都去找他研究解决。因此，由于接近多，交谈多，而且每次接近和交谈，他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和教育，所以，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是难忘的。

陈光同志是广东人，生就一付不高不矮、不肥不瘦的中等身材，经常穿着一件半新旧的中山装。他精明能干，举止灵活，能说一口带广东腔的柳州话。遇见同志和群众，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在他那稍为瘦削而白净的脸上，总是浮现一窝笑容，使人见了就感觉到：他是一个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的人。因此，凡是认识他的同志和群众，都很愿意接近他，把自己不解的问题和心里话告诉他。而他呢？无论工作如何繁忙，都一律热情接待，并且不厌其烦地、很耐心、很细致地对你所提出的问题，逐一的给你答复。遇着有些问

题答复后一时还想不通的，他也从不急躁，不发态度，还是谆谆地给你诱导，直到你认为解决问题，心满意足为止。

他对同志和群众的关心，是体贴入微的。我每次和他见面，他都要问：“近来生活怎样？身体好吧？”尤其是对有病的同志，他更是关心，非亲自去看问不可。记得在警卫队时，有一次我跌伤了脚，他知道后，不但马上前来看问，并亲自到几里外的一个村庄，为我找来一个草药医生给我治伤。日本投降后，我们回柳州工作，那时梁罗琪同志，因为严重肺病卧床不起，他在百忙中也是几天一次的前去看问。梁同志病故后，他还亲自为他奔走筹款，办理丧事。他对群众的生活，也是很关心的，在警卫队时，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进行社会调查、家庭访问，了解群众疾苦，遇到生活有困难的群众，他一面和他们研究安排生活，一面发动同志们帮助他们搞好生产，解决困难。

由于陈光同志态度和蔼，平易可亲，关心同志和群众，具有高度的群众观点，因此同志们和群众都很尊敬他、爱护他、关心他。每逢过年过节，群众都争着请他去吃饭；见他衣服破了，就争着要给他缝补；见他身体有病，就来劝他刮痧（他没有刮痧的习惯）吃药。抗日胜利后，回到柳州，每逢遇着他和我都认识的同志和群众都问道：“陈扬同志现在哪里工作，他的身体好吧？”当我告诉他们，“他现在龙中教书，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高兴，都要我转告他，有闲请到他们家去玩玩，对他表现了非常的亲切和关怀。

陈光同志的生活非常朴素，他不抽烟，不喝酒，很少到

街上吃零食，不随便花零钱，不好装饰。他的行李很少，家具很简陋。他在龙中工作时生活比较固定，但他住房的布置，仍像行军中一个临时的住处一样。他这种俭朴的作风是一贯的，表现在个人的生活上是如此，表现在使用党的经费和同志间的来往也是如此。他使用党的经费，总是精打细算，从最必需、最节省的方面着眼，从来不乱花一文钱。他和同志们来往，总是强调以真诚热情待人，不同意过份的物质接待。他这主张，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节约，另一方面还有他的见解。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到一个同志家去玩，那同志倒一杯开水给我们并开玩笑地说：“请喝一杯平淡而无味的白开水吧。”他当时面带笑容，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只要是真诚热情的招待，这平淡无味的白开水，也会变成滋滋有味的。”我想，这就是他对他那见解的说明。

由于陈光同志生活一贯艰苦朴素，他很能和群众同甘共苦。在警卫队时，每个同志每月全部生活待遇，是四十五斤刚脱谷壳的糙米，除了口粮之外，仅能买到一些油盐。既无菜金买菜，更无零用钱可花。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但就在这比较艰苦的时候，陈光同志和大家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没有菜吃，就和大家一起到河边的竹林去找竹笋、到田里去找田螺做菜。鞋子破了，就和大家一样穿竹壳草鞋。没有牙刷和毛巾，就和大家一样找块白布，实行一物三用——既是面巾，也是牙刷和浴巾。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毫无特殊，因此，同志们很受感动，精神非常愉快，在苦中不但未听到叫苦的声音，相反的警卫队的同志走到哪里，哪里就洋溢着愉快的歌声。

最难忘的是陈光同志对党的工作认真负责，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态度和精神。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而工作、奋斗。因此他学习很好，进步很快，完成工作任务很出色。他布置工作非常具体，有情况、有分析、有方法。布置之后，有的还亲自同大家去做，不能和大家去做的，他也从不放松督促和检查。他修改文件很细致，每一稿件，都要逐段逐句、逐字的加以审阅，不但原则问题他要反复思考修改，就是一个错别字他也不轻易的放过。他处理问题很慎重，从不轻易作决定。记得我在联华印刷厂工作时，有一次去向他请示一个问题，我问他：“敌人已注意印刷厂，我是否应该撤退？”他当时不慌不忙，很沉着的问我：“印刷厂有什么过失给敌人抓吗？”我说：“没有。”他又问：“你个人有什么把柄给敌人抓吗？”我说：“也没有。”随后他考虑了一下说：“既然没有什么过失和把柄给敌人抓住，敌人的注意，还仅仅是怀疑而已，根据当前情况，估计敌人现在还不会对你下手，你可暂时不撤退，但是今后要提高警惕，各方面要多加注意。”他对问题，就是这样经过了解情况、分析研究后才作出决定的。陈光同志身体不太好，但是他的工作干劲很足，他每天的工作，总是在十二小时以上。在警卫队工作时，他每天不是到队的各组去检查工作，就是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访问；晚上不是开会，就是找同志们谈话，或者是看书、写文件。总之除了睡眠吃饭之外，好似没有看见他有个空闲的时间。有时他身体有病，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只是那句老话：“没有什么。”一笑置之。他工作从不畏难，党指向哪里，他就

奔向哪里去。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广西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国民党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斗争环境是相当困难的。桂林是伪广西省政府的所在地，在“七月事件”之后，斗争环境更加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时候，党派他到桂林去任工委书记，他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千方百计的克服各种困难，很快的在桂林开展了工作。但不幸得很，就在他在桂林工作期间，在桂林临解放前的一个月，他被万恶的国民党的特务逮捕了。敌人知道他是桂林城工委书记，熟悉桂林地下党的情况，就对他进行了数十次的严刑拷打，他仍然不忘党的事业，忍受着一切痛苦，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仍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始终没有暴露党的丝毫秘密。于是敌人恼羞成怒，在桂林解放前八天，即将他杀害。解放后我从宜山回到柳州，听到这一噩耗，感到非常的悲愤。

陈光同志是个模范的共产党员，是个优秀的中华儿女，他的生命虽然为敌人的魔爪夺去，他那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永远不死的。

〔作者注〕：

据肖家纯同志调查所得情况，陈光同志是1949年10月5日在桂林被捕，同年11月11日晚上被害。

（《柳州日报》1964年9月19日3版）

他战斗在黎明前

叶惠明

一九四七年秋的一个中午，广西大学女生宿舍来了一位中等身材、个子消瘦，身穿白衫青裤唐装的男青年。同房好友阿珍给我介绍：这是她做布匹生意的叔叔。这位叔叔外表沉静、温和，跟我说话时，明澈的眼睛总是含着亲切的微笑。后来他还来过两次，我也管他叫做叔叔。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个傍晚，党的联系人阿南同我在学校的林荫道上散步，传达党的指示。这位叔叔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对阿南说：“敌人可能最近要出动搜捕，你通知第一线的同志马上撤退。”接着转向我道：“要保守党的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他眼里依然含着微笑。当我惊讶地定眼看他时，他已隐没在道旁的绿树丛中。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位叔叔竟是一位党的领导人哩！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桂林地下党书记陈光同志。

陈光同志是广东梅县人，出生在华侨家庭。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任梅县学委书记。一九四四年在广西敌后领导游击战。历任柳州市临时工委书记、桂东特派员、桂林城工委书记兼桂北特派员。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叛徒

出卖被捕，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被杀害，时年三十一岁。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桂林被捕入狱，接着桂北武装暴动又遭挫折，国民党反动当局屠杀游击队员和当地群众，桂林城内贴满杀人告示和反共标语。特务设防布哨，处处刀光剑影。陈光同志就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中肩负党的重任到达桂林，在随时都有被捕危险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积极开展工作。他经常来园步行数十里到西大，帮助建立和巩固党支部、培养教育党员。在他的领导下，西大党支部执行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恢复和建立起各种师生组织，广泛地联合全校师生，粉碎了托派分子妄图把进步力量引近敌人枪口的阴谋，孤立和打击了反共顽固派。从一九四八年春起，学生群众要民主要和平的呼声又在宣言中、讲坛上、壁报丛中爆发出来。他们团结桂林各校学生，开展了营救被捕同志、声援“同济一·二九”事件、包围造谣的中央日报、迎接被捕释放同学归来等一系列斗争。五月十四日晚，一批党员和进步同学又深入市中心和伪军政机关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党领导下的桂林学生群众谱写了一曲曲广西学生运动的壮歌。

陈光同志在桂北游击队建队初期，兼任特派员。后来对这个大队也还承担了重任。他发动捐献，源源不断地把药物、衣被等送往游击区，还协助安排伤病员就医、抚恤烈属。白日奔跑，晚上起草文件、审查新党员，有时还协助校对装订印刷品……他废寝忘食，做每一件事都十分认真、细致。很少人知道他身患肺病、胃病。

陈光同志的个人生活十分刻苦，他严格执行每月领一百二十五斤米生活费的规定。往往一个月不吃一次肉。由于节衣缩食，引起了邻居的议论：“陈老板做生意的，看他吃什么好菜？”他为了掩蔽自己，每次买了肉，先把它挂在门口。负责掩护机关的高天梅同志见他带病工作，买了几只鸡蛋给他，他劝止说：“千百万人正在饥寒交迫，有饭吃就不错了，鸡蛋不是我们吃的。桂北的同志在流血牺牲，要多支援他们。以后千万不要为我多花钱。”

陈光同志的父亲在南洋去世，母亲带着孩子回国，姐姐在大革命时牺牲了。有次母亲来信说生活过不下去，要讨饭了，不久又来信说她病重，希望能最后见一面。陈光同志心里很难过，他没有钱寄去，也不能离开岗位。他回信说：

“儿子现在无法回家，请母亲原谅，望宽心等待我以后回去同您老人家团聚。”但是他母亲等不到那一天，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陈光同志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有个邻居的孩子病危无钱医治，他得知后马上拿出两块光洋捐助。这位邻居哪里知道这些钱是他夫妇的伙食费呵！高天梅同志患风湿症，发作时行动困难，她怕花钱不肯治，但陈光同志每次都为她买药，时常对爱人阿秀说：“‘姨妈’（即高天梅）为革命吃了许多苦，她丈夫又牺牲了。我们要处处关心她，解放后就接她到我们家里住。”陈光同志被捕前，“姨妈”的病又犯了，刚用了一帖膏药，陈光同志就入狱了。现在，高天梅同志的病一犯，就自然地想起陈光。是啊！有什么比这阶级情谊更深厚、高贵呢？